

导论：

20 世纪中国文化之鸟瞰与扫描

影视文化即电影电视文化，为 20 世纪人类科技与文化创造中最引人瞩目的存在之一。不论从怎样的意义上去看取，其对 20 世纪乃至未来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中国影视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影视文化的潮起潮落又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整体的潮起潮落相伴相随。因此，当我们开始进入中国影视文化的世界遨游巡礼的时候，有必要对 20 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热”及 90 年代中国文化景观进行一番鸟瞰与扫描。

20 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有两次在性质、规模、影响上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化热”，一次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中期。这两次“文化热”除了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本体构成、内涵、形态的改造和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改造和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生于本世纪初的中国电影和创生于本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电视，一方面以其异军突起之势，在本世纪中国社

会、历史的曲折沿革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注入了新的血液与因素；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历史运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给中国影视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的烙印。因此，将中国影视文化置放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认识与把握，是十分必要的。而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历史运动中，最为耀眼、变革力度最大的两次“文化热”便成为本书最先予以关注与表述的对象。

一、第一次“文化热”——“五·四”前后

中国文化的整体形态、格局、内涵与实质在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体系中相当稳固地被维护和延续着，并历经风雨，屡遭劫难，却依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极大的同化力。然而，于1915年开始启动的一种新的文化力量、文化思潮与文化运动，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短短数年时间里，迅速荡涤着绵延数千年的封建旧文化，掀起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一次“新文化运动”这也便是所谓20世纪第一次“文化热”。

掀起这场“文化热”的标志是陈独秀为首创办的《青年杂志》（即其后的《新青年》杂志）的成立。1915年《青年杂志》的发行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海外。《新青年》高举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德先生”（英文 Democracy，“民主”之意，被译为“德谟克里西”先生）与“赛先生”（英文 Science，“科学”之意，被译为“赛因斯”先生）的大旗，向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全面开火（他们的口号之一便是“打倒孔家店”）。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变革运动根本不同的是，此次文化变革运动不是在封建堡垒内部的、建立在不冲毁封建专制体制前提下的运动，而是建立在1911年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旧的封建专制体制，但新的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一整套体制尚未建立的条件基础之上，其目标是建立全新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格局。承担这一巨大历史使命的主导力量是一批受过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熏陶和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关注社会、关怀民生、以天下为已任的忧患意识、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文明中的许多新鲜的思想与理念。在政治变革一次次失败（从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改制”、“变法”运

动均遭惨败结果，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近代农民革命，即使是影响最巨的“辛亥革命”及此后孙中山等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也均告失败）教训面前，这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进入了思想文化领域，企图通过改造国民以树新人的“思想启蒙”，而使国人从昏昏噩噩中觉醒起来，为这个民族、为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和进步而斗争。在这“思想启蒙”为主题的文化运动进程中，一批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巨匠和杰出代表人物应运而生，以他们为核心，一批“新青年”也茁壮成长。而储备、造就和推行“思想启蒙”的基地则是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和其他新式学堂。《新青年》所传播的新的思想、知识与理念，尤其此后发动的“文学运动”，直接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变革运动。因此，当1919年5月4日一批热血青年从大学校园中走出，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旗开始了一场揭开中国现代历史序幕的革命运动时，人们自然而然地把“五·四”与此前、此后密不可分的思想文化思潮联结在一起，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高潮在“五·四”前后，其成果则延伸到整个20~30年代。

之所以将这场“新文化运动”描绘为一次“文化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本身的改造。先进的知识者们看到中国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极为严重的阻挡与障碍，换言之，先进的知识者们认为要想使中国国富民强，文明进步，非解决思想文化问题不可。而建立现代中国的新的思想文化，其资源何在？先进的知识者们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战略与策略——向西方文化学习，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同时对所有传统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毫不留情的、彻底的清算与批判。那这样一次“文化热”，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新”来予以总体概括。具体说来，这“新”体现在至少以下几个方面：

1、新思想：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许许多多西方近现代思想学说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一古脑儿被带入中国，被人们所追寻、宣传和推荐。马克思、恩格斯及克鲁泡特金、欧文、圣西门、杜威、罗素等名字为知识界所熟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学说也在知识界得到传播。从思想学说的发源地和传播流向上看，有四个文化区域对西方近现代思想学说的引入中国影响巨大，这便是日本、俄苏、欧洲、美国。而且由于这四个文化区域与中国特定的双边地缘和其他方面关系的差异，由于这四个文化区域当时

的主流文化思潮的特点，而使一批分别与上述四个文化区域发生过某些关系（如曾在特定区域留学或生活过）的知识者们，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接受了这些文化区域的主流文化思潮及文化价值的深刻影响。

(1) 日本：日本与中国在地缘上处于所谓“一衣带水”的关系。从文化源流上看，日本文化在漫长的古典时代，一直处在中华文化的辐射之中。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踏步地向西方学习，国力迅速提高。进入近代，被中国人惯称为“小日本”的日本国，依仗自己迅速增强起来的国力，竟把地大物博的中国当成自己的侵略、掠夺的对象，而且一再得手。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先后留学日本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一方面到日本躲避国内军阀混战的时局，潜心学习，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发达富强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直接感受、体验到了贫弱之国家的子民，在他国眼中所受到的轻蔑、侮辱乃至屈辱。因此，“民族主义”的思想追求成为这些知识者们共同的思想特征与价值取向特征。

(2) 俄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名言准确生动地描绘了“新文化运动”进程中，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为标志，迅速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一种呼应关系。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等人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之“圣火”“盗取”到中国，并使之熊熊燃烧起来的代表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知识者起初是以思想启蒙者的立场、姿态与身份介入“新文化运动”的，而当他们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后，便开始转入实际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并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3) 欧洲：这个最早掀起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并诞生了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区域，以其文化积淀之丰厚，近代文明之发达吸引了万千东方年青学子与寻求国富民强道路的先驱者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蔡畅等革命者，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等文人，徐悲鸿、刘海粟、贺绿汀等艺术家都在“欧罗巴”这块充满着未来梦幻与现实焦灼交融的土地上，描摹着各自的未来世界的蓝图。应当说，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中，成为其后各自思想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基础。

(4) 美国：这个崛起不久的“新大陆”，在摆脱了其欧洲母体文化的历史负担前提下，创建了世人瞩目的新型社会机制。由于这是一块开垦之初的

土地，全世界寻求发展富足的探险者们迅速聚集于此；由于这是一个急待开发的巨大空间，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人们也纷纷奔向这里。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以空前的规模造就出其杂质纷呈的“多元文化”，这使得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成为这文化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思想潮流。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宋氏三姐妹、宋家兄弟及民国时代的许多政坛人物都在年轻时代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胡适、闻一多、谢冰心、梁实秋、洪深等也将这些思想因子带入了自己的学说创建与文化创建之中。

2、新语言与新文学：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与形式，文学则是语言的艺术，是最敏感地传播、运用与创造语言的领域。文化变革的程度与水平，往往可以通过其语言、文学的变革程度与水平来衡量和确定。充当“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恰恰是语言领域的“白话文革命”及与之紧紧相连的文学领域的“新文学运动”。作为中国封建主流文化的载体与形式，古文一直在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里身居正宗地位。尽管白话文在中国民间早已流传甚久，但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战将”们瞄准了这一目标，从对“白话文”的倡导，对“古文”的摒弃，到对“封建文学”的“炮击”，对“文学革命”的发动，使“白话文革命”与“新文学运动”成为合二为一的革命运动，吹响了“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战斗号角。正因此，“新语言”与“新文学”也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是这一运动鼓吹最多、也最有成就的先驱。鲁迅以其最为深刻的思想、最为犀利的笔锋、最为成熟的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白话文写下了中国最早“报告文学”的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的冰心、朱自清、庐隐、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杨振声、俞平伯；“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冯沅君（沅女士）；“新月社”的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以及宗白华、汪静之等一大批青年文学家，以他们极富创造力、想象力的手笔，铸造出现代新诗、新散文、新小说，使“白话文”打败了古文，使“新文学”战胜了旧文学。“新文学”发展到20~30年代，又涌现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巨匠及丁玲、夏衍、艾青、臧克家、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萧红、萧乾、沙汀、艾芜等文学名家，使“新文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水平，成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文化的新的话语方式

与新的思想资源。^①

3、新科学、新学术与新教育

“科学”与“学术”在中国古代、近代史上并没有获得其真正独立的地位，基本上归并在“经学”或“国学”之中，而西方科学与西方学术的引入，使得自然科学的地位迅疾提升，这首先是国家民族的兴衰令时人看到西方发达富强的重要原因是“船坚炮利”，而“船坚炮利”背后靠的是发达的自然科学与技术。要使更多的中国人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能力，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数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建筑学等一批新兴学科开始在中国创立，李四光、竺可桢、赵元任、陈省身、梁思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传统“国学”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土壤与基础，此时已失去了它足够的号召力，而转向新的学术形态，引入新的学术话语，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也呈现出全新的形貌，胡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陈寅恪、钱穆、马寅初、吴文藻、朱光潜、王力等为这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时“科学救国”思想并提的还有“教育救国”。与传统私塾、“科举”等教育方式与人才选拔、培养方式完全不同的是，近代引入的西方新式学堂尤其是大学的理念与方式，在“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出了格外夺目的光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凝聚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类精英人物，蔡元培、张伯苓等杰出教育家为此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新社会关系与新社会风尚

由封建专制体制支配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在“新文化运动”巨浪的冲击下，发生了剧烈震荡与变化。独立自主、人格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尊重。破除旧习俗、旧礼教，追求新风俗、新风尚，也成为社会关系、社会风尚改革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在长幼、尊卑、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上，在社会机构、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关系调整。此时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两股潮流为“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对于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的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于女性摆脱旧礼教、旧习俗而获得与男性同等权利的呼吁与倡导，使得背叛封建家长制大家庭的束缚、独立寻求个人生存之路成为新的风尚，尤

^① 参见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其是妇女与男子同校、同台（表演）、同工、同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在中国社会不断掀起轩然大波。为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在相互尊重与平等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是这思潮所推动的重要标志。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以及高君宇与石评梅、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结合，都典型地体现了这时代潮流的特质。除了个体性行为外，以团体结社方式，自发地将志同道合者结合起来，鼓吹、实践新社会关系与社会风尚的社团组织在此时也极为活跃，如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的“觉悟社”及“新潮社”、“湖畔社”“国民社”“工学会”“共学会”等社会组织在传播新理想、新社会风尚方面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①。

5、新艺术与新事业

“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了现代中国的各个新型艺术门类品种，使这些新的艺术获得了极强的时代精神与革命精神。

(1) 戏剧：中国话剧在历经晚清末期的“学生演剧”、留日学生的“新派剧”、辛亥革命后的“文明戏”等阶段探索基础上，在“五·四”前后获得了进步文化人的极大关注与参与，进入了其发展的旺盛时期。胡适、郭沫若都为新生中国话剧写下了最初的剧本，其后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积极推动，使中国话剧在“新文化运动”进程中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延伸到30年代，以曹禺一批深刻、扎实的戏剧创作为标志，达到了她辉煌的高峰。中国传统戏曲中的集大成的剧种——京剧，在大变革的时代也不断地进行改良，融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到“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一批代表性剧目的推出，取得了享誉世界的艺术成就。

(2) 音乐：新的音乐伴随着西方文化、西方音乐的传入，伴随着新兴西式学堂的普及，而得以迅速推广。自李叔同填词、编曲的一批“学堂歌曲”的流行，经赵元任、刘天华、肖友梅、黄自等的倾心倾力改造与努力，具有中国特色、具有现代结构样式、充满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在蕴积中走向成熟。到30年代以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为代表的一代音乐匠匠的出现，使极具号召力与感染力的伟大音乐作品传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① 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第83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3) 舞蹈：一方面，欧美式的交谊舞进入社会上层交际圈，成了社会上层人士交往的一种方式。在上海等发达城市，随着各国人士的大量涌入，娱乐场所的逐渐增多，以跳舞为谋生手段的舞女也成为一种时髦职业，这在客观上推广了欧美式的“舞蹈”理念与方式。另一方面，一些探索舞蹈艺术，尤其是适应现代中国需要的、具有时代精神与民族品格的新舞蹈的先驱者，为舞蹈艺术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奠定了基础，吴晓邦、戴爱莲等即是其中的代表。

(4) 美术：美术似乎对时代变革、文化变革格外敏感、敏锐。实际上早在晚清与民国时期，李叔同等已开始了具有现代感的美术理念与形式的探索了。闻一多等在此期间也以培育新型美术人才而在现代美术教育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将近、现代西方各种流派的绘画技法、形式，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需要，大胆地挑战传统，创造现代中国美术体系，成为一批有作为的美术家的共同追求，徐悲鸿、刘海粟、蒋兆和等即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作此时也鲜明地体现了较为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丰子恺创造的中国现代文人的“漫画”更以清新别致的方式，昭示了“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

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联的、在此一时期异军突起的新兴文化事业领域有新闻业、出版业等。据不完全统计，仅“五·四”时期，全国白话报纸（包括各地学生团体创办的报纸）就至少有四百种之多。白话杂志除《新青年》外著名的还有《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新民评论》、《新潮》等。特别是各种报纸的副刊，登载了大量的白话文作品，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等为代表的出版重阵，推出了介绍西方思想、学术、文化及现代中国著名白话作家的大量图书，为世人瞩目。民营广播事业也在此时起步。至30年代中国新闻业、出版业步入全面繁荣时期。这一领域里的著名人物有邵飘萍、成舍我、张元济、胡愈之、叶圣陶、邹韬奋、范长江等。

中国新兴的电影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中，艰辛而曲折地前进着。尽管中国电影遭遇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压力，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浸染，经过一批进步的、优秀的人物的参与和渗透，终于在三、四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创造出了电影史上的辉煌业

绩，塑造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文化鲜明而独特的精神、气质、性格与形象。郑正秋、张石川、孙瑜、吴永刚、夏衍、田汉、聂耳、阿英、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史东山、沈西苓、费穆、阮玲玉、金焰、胡蝶、赵丹、白杨、周璇、石挥、袁牧之、陈波儿等都是中国电影文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 20 世纪第一次“文化热”从思想文化领域出发，很快便转入了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之中。严峻的民族斗争与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人将关注点从思想“启蒙”转移到民族“救亡”。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张扬个性、兼容并包、尊重科学、追求民主的精神，却生生不息。在炮火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战略、方针与策略。毛泽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总结、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化实践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民族化”、“大众化”新文化的整体发展战略，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提出了党对文艺创作的功能、目的、标准及对诸多复杂关系的辩证认识等方针、策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众多带有战略指导性的文化政策，这对中国 40 年代以来的文化建设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长达半个多世纪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频繁剧烈，文化领域已很难独立地按照某种“规律”去运行，要么成为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的一支战斗力量，要么便退守于文化人自造的狭窄空间。一句话，作为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辐射社会的“文化热”已不再可能成为现实。

二、第二次“文化热”——80 年代中期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领导中国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政治运动的主题为经济建设的主题所取代，“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在完成了拨乱反正的政治领域的历史性使命之后，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机构、社会风尚开始重建。一批从“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中走出的人们，一批在重新打开国门后放眼看世

界的人们，一批敏感、激进的知识者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 70 年的 80 年代中期，重新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反思，从而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掀起了新一轮“文化热”。

80 年代中期兴起的这场“文化热”，与 70 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认为，这两次“文化热”都是由精英知识分子为主体发动的、以“思想启蒙”为内涵的“文化运动”。其共同依据是面临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其共同参照对象是西方发达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水平；其共同目标是推动中国迅速富强、进步，实现现代化；其总体特征则都是“反传统”、“反思传统”，即反对或反思传统文化中那些阻碍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那些愚昧的、落后的、劣根的因素。

当然，这两次“文化热”的差异与不同也是显明的。首先，其所处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地位的巨大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与欺侮之际。而 80 年代的中国，早已是一个有着相当综合国力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早已以其自尊、自强的形象博得世人尊敬。其次，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世界格局的巨大不同。20 世纪上半叶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摧残了自然的环境，也摧残了人类的文明。而 80 年代“冷战”已趋于结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的时代主题。再次，其“运动”走向的差异与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思想启蒙开始，走向政治斗争的；而 80 年代这一次“文化热”则恰恰相反，先从政治斗争入手（包括“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尔后进入到思想启蒙阶段。简单地概括起来，第一次“文化热”是从文化（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第二次“文化热”则是从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

以批判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现当代理论、思想、学术成果为主要任务，这一次“文化热”在思想学术领域、文学艺术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思想学术领域的人们开始在政治层面对其进行批判，后来人们将政治批判的视野又延伸到“文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去（如“反右”斗争），到 80 年代中期人们则将批判与反思延伸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人们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在 70 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

义，因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民主）的问题在中国依然是个需要补课的重要命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名著入手，我们需要了解，在关闭了对外开放大门几十年后，西方文化已经又有了哪些新的探索、新的成果。

于是我们便在《百科知识》、《新华文摘》、《读书》、《哲学译丛》等众多杂志上看到了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的文章。而译介规模与社会影响最大的两套丛书则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由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丛”丛书。影响最大的思想方法论为所谓“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流传最广的西方思想家、学者为萨特、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风靡一时。

在引进西方现代思想学术理论的同时，思想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领地入手，开始了共同的文化反思。如哲学界的关于“主体论”问题的论争；历史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尤其是封建社会历史）的阶段划分问题的论争、对于若干重大历史现象（包括历次农民运动）的论争、对于若干重要人物（包括对现代史上、中共党史上若干重要人物）的重新评价等；文学界对于文学史上若干重要现象（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若干文学运动、文艺争鸣等）的重新认识、对文学史上若干重要人物（包括以往遭遇猛烈政治批判的人物）的重新认识、对文学创作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如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多元组合等）等；法学界、社会学界、经济学家、语言学界、政治学界等一大批学者也加入到这规模巨大的“文化反思”中来。在此一时期青年学子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著名学者李泽厚。除了他所主编的“美学译丛”外，他在哲学、美学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本思想史著作，以文化反思的立场与视角，对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现象、问题进行了富于新意的描述、概括与梳理、表述。

海外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及各方面学者此时也以文化批判与反思的一些著作、言论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及余英时、成中英、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黄仁宇、李欧梵、林毓生等的著作也在国内学界广泛流传。

在文学艺术领域，文化反思通过反传统的方式与新思潮的追求得以充分体现。

1、文学：

文学领域里经由 80 年代初王蒙等作家的努力，使西方现代派文学迅速引入中国文学创作的视野之中。意识流、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为文学界所熟悉，并尝试摹仿与再创造。至 80 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里涌动起文化反思的潮流，这种潮流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有一个共性，即把传统文学创作中真假、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的界限给以模糊，并普遍地融入更多理性的、传奇的、抽象的内涵。

(1) “寻根”文学：将笔触延伸到传统文化的根蒂，对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雄奇、瑰丽与丰富，及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沉重、冷酷与神秘，进行超越二元对立价值观的深刻反思。韩少功的《爸爸爸》（文艺理论家刘再复曾写过《论丙崽》的长文，对此篇小说予以全面分析与阐释）、郑义的《老井》（后被拍摄为同名影片，吴天明执导，张艺谋、吕丽萍主演，上映后获国际电影节大奖）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其中《棋王》、《孩子王》被陈凯歌拍成了同名影片），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其中《黑骏马》被谢飞搬上了银幕，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莫言的“《红高粱》家庭”系列（其中《红高粱》成为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也是标志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影片）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2) 历史反思：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站在文化反思的立场上予以重新审视。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黎汝清的《湘江之战》、《皖南事变》、乔良的《灵旗》（吴子牛据此改编拍摄为《大磨坊》一片）等是其中的代表。

(3) 情与欲。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描写、表达两性间相亲相悦的情感、爱欲的题材领域，此时也得到突破。继 80 年代初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后，此时两性间的情感、爱欲的描写与表达，更超越了其社会性层面，而进入更隐秘的人性深层。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章。

值得提出的是，此时活跃于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王蒙、刘心武、

丛维熙、张贤亮、谌容、鲁彦周、陆文夫、路遥、李国文、古桦、叶楠、白桦、李准、高晓声、李存葆等人的作品，尽管其目标是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现实生活中诸多社会矛盾的揭示，对当代中国人心态的描摹与分析，但也不无文化反思的意蕴与品格。他们的许多作品经由电影艺术家的改编和艺术再创造，被搬到电影银幕上，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如《如意》、《良家妇女》、《牧马人》、《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人生》、《高山下的花环》等。

2、戏剧：80年代中期“戏剧危机”的呼声此起彼伏，传统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理念遭遇空前的生存困境。随着西方现代派戏剧的翻译、介绍——荒诞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等戏剧思潮开始风靡，贝克特、奥尼尔、萨特、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念与戏剧表现方式为戏剧界所熟悉。重要的是，戏剧家们已不满足于“写实”地参与世界与人生，而寻求戏剧与世界、戏剧与人生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这便是所谓“探索戏剧”（中国式“现代派”戏剧）由来之原因。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魔方》、魏明伦的《潘金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在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戏剧表现手法相结合基础上创作出的《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戏剧作品中，除了形态本身的反传统探索外，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含量更重、更高。

3、美术：

也许美术界遭遇的西方现代派的冲击与震荡最为剧烈。达达主义、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派”与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一道，涌入中国画坛，一时间使中国画坛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景观。各持已见的美术界人士就现代美术观念等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层出不穷，而传统现实主义主流美术观念显然受到冷落。事实上，美术界的文化反思早在8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罗中立的一幅《父亲》塑造出的父亲形象融刚毅与苦难、执着与麻木、可敬与可怜于一体，极具震撼力与感染力。而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当属中国美术馆“人体艺术大展”的隆重举行。如果说20年代刘海粟因画女性裸体而备受社会褒贬，那么此时的万人空巷争睹裸体艺术画作则显示了社会更多的开放与宽容。而陈醉一册本属西方美术史论方面学术著作的《裸体艺术论》成为当年全国名列榜首的畅销书，又显示了人们对跨越传统文化樊篱的“离经叛道”观念与行为的企

盼。

4、音乐：

西方音乐的引入、严肃音乐的转型、流行音乐的崛起是此一阶段中国音乐发展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观。长期以来被当作资产阶级艺术而不敢登台的西方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尤其是交响乐与欧美流行音乐（包括摇滚乐、乡村音乐及大量影视音乐），在青年中颇受青睐，与此相关的录音磁带及各类音像制品也极受欢迎，还有与此相关的各类音乐表演（音乐会等）、音乐讲座也十分热闹红火。因为在不少年轻人眼里，这些音乐与“文明”、“现代”联系在一起。相形之下，民族音乐发展的步伐则缓慢得多。“学院派”和专业人士圈里的严肃音乐，在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下，开始了其极富现代感和个性化的创作。谭盾、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是其中的代表。随着海峡两岸敌对状态的缓和，台湾校园歌曲（如《乡间的小路》、《爸爸的草鞋》、《外婆的澎湖湾》等）如一缕清风，吹进大陆歌坛，并很快家喻户晓。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可谓柔情似水、风情万种（如《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等），令无数听众、观众为之倾倒。这些歌曲 80 年代初还被视为“靡靡之音”，此时则普遍被接受。已经颇负声名的朱逢博、李谷一此时也开始一反传统歌唱方式，探索更具现代感和个性化的表现，从而引来广泛的争议。伴随着港台流行音乐的大举“入侵”（这其中一年一度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邀请港、台歌手参加演出，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苏芮、蔡琴、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费翔、齐秦、姜育恒、王杰、张明敏、奚秀兰等人的名字与歌唱为人所熟知。在经历了一段摹仿（对港台流行音乐）与学习之后，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创作逐渐活跃并达到了这一阶段的高潮。崔健的《一无所有》、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及此后刮起的“西北风”（代表作有《黄土高坡》等）及赵季平创作的电影歌曲、张黎与徐沛东合作的影视歌曲等为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创作范本。

5、舞蹈：社会性舞蹈的普及及流行、现代舞的崛起、民族舞的现代化构成了这一时期舞蹈发展的三个新的“增长点”。社会性舞蹈包括源自欧美的交际舞和从民间舞蹈发展出来的集体舞。跳舞成为一种时尚，在城市社区和大学校园、机关团体活动中登堂入室，这为职业的舞蹈艺术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而在借鉴、学习西方及各国现代舞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中国现代舞，也开始活跃于舞台、社会及电视荧屏（如出现在各种电视综艺节目中），

陶金率领的现代舞团的各式表演还被搬上电影银幕（田壮壮导演的影片《摇滚青年》）。民族舞将古典舞蹈、民间舞蹈与现代舞结合起来，试图走出一条新路。80年代初《丝路花雨》等已开始了这种探索，杨丽萍、沈培艺等的创作与表演此时达到了较高水平。

反传统的而非循规蹈矩的、探索的而非保守的、新潮的而非古旧的、个性化的而非常规化的、现代感的而非老成持重的等等特征、风格，构成了第二次“文化热”文学艺术领域新的形态风貌。即使是传统的创作理念、方式、方法，也在这整体的思潮冲击下，迈开了变革、创新的步伐。

与第一次“文化热”时的情形大大不同的是，融入了较多现代科技含量的电影电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基础上（中国电影初创于1905年，延展至此时也有80年历史，中国电视初创于1958年，延展至此时也近30年历史），以惊人的速度大踏步前进，“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新锐的文化存在形态，迅速超越其他文学艺术门类领域在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的现实地位，而成为80年代中期第二次“文化热”中的极具社会号召力与影响力的生力军。

中国电影此一时期在人才队伍方面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之最”，即出现了所谓“五代同堂”的局面。20年代即投身电影事业的前辈夏衍、阳翰笙、吴永刚、孙瑜等宝刀不老，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30—40年代投身电影事业的电影艺术家陈荒煤、司徒慧敏、白杨、张骏祥、谢添、凌子风、桑弧、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等以其丰富的艺术经验，创造着新的艺术成就；50—60年代活跃于影坛的谢铁骊、成荫、汤晓丹、王苹、谢晋、于蓝、田华、王晓棠、严寄洲、水华、谢芳等大显身手，其中一些人创造出了个人艺术的最高成就；70年代末崭露头角，此时担当中国电影创作中坚力量的“第四代”成就斐然，吴贻弓、黄健中、张暖忻、胡炳榴、丁荫楠、谢飞、郑洞天等的创作步入成熟；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何群等推出一批令世人耳目一新的电影作品，并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上摘取大奖，迈出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台湾、香港的电影创作此时也达到了高潮状态。台湾的侯孝贤、李安、李行、杨德昌、王童；香港的王家卫、吴宇森、徐枫、徐克及艺员成龙、张曼玉、周润发、梁家辉、张国荣、张艾嘉等都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国外及海外丰富多彩的电影的引进与上映，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感觉与享受，并引发了他们生动的世界文化的联想与想象。一批异域电影学术

著作的译介与传播，打开了电影人、文化人的创作视野与理论视野，深化了人们对电影文化、电影本体的认识与理解。电影教育进入大学课堂，培养了潜在的有较高素质的电影观众，也为电影文化的继续进步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中国电影受第二次“文化热”的思潮影响，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此时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这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体现尤为充分。在活跃的电影批评领域，也同样有着此次“文化热”思潮的回响，如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大讨论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达到高潮。

中国电视此一时期占尽天时地利，取得令人艳羡的长足发展，这从三个系统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可以见出。从大众传播系统来看，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印刷媒体尽管还保留了其主流地位与传统优势，但相当一批读者的阅读时间开始减少，而投放于观看电视。广播、电影、音像等与现代科技紧密相联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各有其听众、观众，但全息性特征与便捷的收视方式，使电视格外受到观众青睐。从艺术系统来看，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领域里的创作虽然拥有众多的读者，但电视艺术创作的繁荣却开始有力地压缩着这些传统文学创作样式的生存空间。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的创作与传播空间更直接受到了电视的挑战与冲击，电视还以她特有的媒体优势将这些艺术部门的创作、表演人才吸纳起来，将这些艺术部门的不少创作素材抓取过来，以拓展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从娱乐休闲系统来看，琴、棋、书、画等传统方式依然拥有其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健身、垂钓、卡拉OK、迪斯科、户外旅行等成为新的时尚，但这些娱乐休闲方式每一种往往只拥有特定的群体与队伍，然而电视则可以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阶层、性别等的局限，成为真正的面向大众的娱乐休闲方式。

中国电视此时影响最大的几种节目类型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以“专题片”形态出现）和电视综艺节目（尤其是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代表的各类综艺晚会节目）。电视剧的创作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名著改编电视剧将流传久远的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及现代文学名著搬上荧屏；情节剧以曲折生动的情节故事、通俗晓畅的叙述方式取得成功；历史剧、人物传记体电视剧以及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改革题材电视剧，或针砭时弊，或发思古之幽情，或对历史人物重新审读，这几类电视剧因其人文历史含量较高、现实关注较多，而渗透了更丰富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内涵，不少作品一经播出便引来强烈社会反响。这一时期电视纪录片是从电视风光风情片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其中许多片中的音乐、歌曲在观众中广为流传），尔后受到此时“文化热”思潮的影响，在片中融入大量人文关怀内涵，显示出电视参与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的较大潜力。

香港、台湾电视剧及日本、美国、英国等地的电视剧、电视片在此时也大量涌入，不少节目播放时出现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对电视文化的普及、覆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电视的交流在迅速加快，电视理论研究开始超越起步阶段水平，电视批评日渐活跃，电视教育也有了一定的进步。电影的发展对电视影响很大，电影文化的思潮对电视文化的思潮产生着直接的辐射。影视互动局面开始形成。于是“影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为全社会所热烈关注，“影视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一支，也就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文化整体思潮的影响与制约。

20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热”，使文化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参与了中国社会历史前行的进程。从表面上来看，打开国门，接受吸取西方文化的成果是其共同特征，这一点的确毋庸置疑，但从深层本质上来看，异域文化的冲击只是一个契机，中国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领域中的代表人物们，并非仅是简单地“拿来”，而是植根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土壤、现实土壤中，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社会实际，创造出了全新的而又符合中国民族需要的现代文化。中国的影视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在其形态、内涵、品质、品格等方面深受整体文化思潮涌动的影响与制约，又以其独特的理念、方式、方法丰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内涵、品质与品格。

三、90年代的文化景观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处于更为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政治背景，呈现出更为多样的景象、景观。近距离的观察反而多有局限，这里笔者不敢妄加概括，因此只作挂一漏万的粗略“扫描”。从总体上看，9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全面进入“转型期”的历史阶段。

1、经济政治背景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与特定时代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未必表现为简单、直接的决定或对应关系，但从经济政治